

評介鄭憲博士論文——

呂芳上

「中國同盟會的組織、領導與財力（一九〇五——一九一二）」

原名：「The Tung-meng Hui: Its Organization, Leadership and Finances, 1905—1912」

Ph. D. Dissertation,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, Seattle, 1962

著者：鄭憲 (Shelley Hsieh Cheng)

微捲製作：University Microfilm Inc., Ann Arbor, Michigan, No. 62—6625.

(一)

國內外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，風氣之盛是近十數年來的事，而國內則更較國外為晚，因此國外有關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成績，國人自不可漠視。

革命團體是清末革命運動的主要力量，革命成功以前，興中會、華興會、光復會、同盟會、共進會等團體，可說是清季革命運動的主流。（註一）對於這些革命團體的歷史，國內除了有大量的史料刊佈以外，近年來有劉元珠之「華興會」，梁惠錦之「光復會」的專題研究，而集其大成的是張玉法先生「清季革命團體」的印行。但是以清季革命運動的主軸——同盟會為專題的研究，則至今仍付諸闕如。幸而在國外學者的成就，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。

依據 Gordon Shulman 的調查，（註二）在一九七〇年以前，西方語文以同盟會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共有三篇：高慕軻 (Michael Gaster) 的「同盟會思潮」(Currents of Thought in the Tung-Meng-hui, 1962)，以研究同盟會時期的思想

評介鄭憲博士論文——「中國同盟會的組織、領導與財力（一九〇五——一九一二）」

爲重心，出版時易名爲「辛亥革命與中國知識分子」，此書張朋園先生曾有評介（註三）。其他二文，一是鄭憲此文，一是紐約大學李大陵的「同盟會與中國革命」（"Tung-meng hu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, 1905-1913", 1967），李文亦於一九七〇年由美國聖若望大學予以出版。在三篇中，鄭文完成最早，資料最富，貢獻最大，可惜却因作者的英年早逝，未得修訂出版。

(一)

鄭憲，福建閩縣人，南京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，華盛頓大學博士。其父鄭烈係閩籍黨國先進，曾有功於民國的創建。鄭憲以同盟會爲博士論文，與家庭淵源似又不無關係。可惜的是鄭憲在博士論文完成後不久，即以癌症去世（民國五十五年），爲史學界的重大損失。

鄭憲論文以同盟會的組織、領導與財力作爲研究的主题，十分深入而詳盡。

第一章敘述同盟會成立的背景，說明中國革命的源起，尤其著重於中山先生與興中會的探討。在文中，他引介了當時許多西方報刊的記載，指出興中會時期中山先生倫敦蒙難一事，實爲西方人士普遍認識中國革命領導者孫逸仙的開始。同時他分析興中會有資料可據的三百二十位會員中，粵籍人士占了百分之九十五（三〇五人），而未受教育者也達百分之八十八（二八四人），這一統計與一九〇五年同盟會的會員成分相較，實有顯著的不同。同盟會初期的會員九六四人，來自十七省，其中粵、湘、川、鄂四省共占百分之六十，而領導幹部，都以知識分子爲主，這也是其後革命得以順利推進的主因。一九〇〇年以後革命情勢雖因清廷的對外連串失敗而漸好轉，但鄭憲以爲這時興中會實已名存實亡，除了香港「中國日報」的宣傳及孫中山先生的個人活動以外，團體實已不發生力量。

第二章，同盟會的革命背景，敘述了興中會以外的其他革命活動，尤其著重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間，日本留學界、華興會、上海地區、光復會，及湖北的革命活動。如果說同盟會的成立是集百川而成的革命洪流，則鄭憲此文，實已把成流的涓滴作了詳盡的分析。

本文的重點在第三、四、五章。第三章說明同盟會的組織與領導，作者明確的指出同盟會是一個嶄新的革命組織，與中會會員固然也加入了新團體，但是同盟會成立時，原與中山先生有過從的，只有十人而已。同時他分析同盟會權力中心的轉移，是隨中山先生與黃興的革命活動而變化的，例如一九〇五年八月至一九〇七年春，東京總部是主要的重心，一九〇七年春，中山先生赴安南，河內便成爲革命活動的指揮重鎮，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，南洋——尤其是新加坡，又成爲革命活動的中樞要站。同時他不諱言的指出同盟會內部的分裂，減弱了革命陣營的力量，這一弱點在民國建立以後，同盟會會員的分化，尤見其影響。不過，他也指出，章炳麟、陶成章等人的立異，在革命運動中並沒有影響到起義的進行，「三、二九」黨人的前仆後繼，共襄義舉，顯示了中山先生領導下的同盟會，仍具有極高的向心力。辛亥革命的成功，同盟會當然更是表現出了極大的力量。

本來革命運動的具體表現，一是宣傳，一是起義，但不論是靠刀鎗，或是紙筆，都缺少不了「錢」，同盟會時期的經驗，更可以證明：革命經費的豐絀，可以影響宣傳刊物的出版，也可以影響起事的成敗，甚至於關係革命陣營的團結。而經費的籌措，通常又是革命家絞盡腦汁，費盡心血的重要工作之一。本文第四章即以同盟會的經費爲主題，列爲專章研究。鄭憲在文中即指出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中，爲了籌款，曾花費了相當的苦心與時間。籌款的對象可以是親戚、同志、華僑甚至於外國人，他們或是紳商大富，或是升斗小民；籌款的方式，或動以義氣進行募捐，或動以利權，印債券，允抵押，用借貸；籌款的地區由國內，南洋，歐洲到美洲，而南洋又是最主要的地區。革命款項的籌得是曲折又動人的，張靜江的慷慨輸捐，林直勉傾其叔父家產，李海雲挪用父親公款，居正、孫武、焦達峯的計取金菩薩等都是其例。而依據鄭氏的研究，以南洋爲例，籌款的共同特點：一是因保皇黨的活動影響革命黨的籌募；一是華僑下層社會對革命的熱心，較之股商大富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而革命活動遭挫折，受困難，又急需款項時，往往也是籌款最困難的時期，相反的，辛亥起義成功以後，捐款却源源而來。鄭憲更詳盡分析九次起義的籌款及用款情形，總計九次起義共花費港幣六十七萬九千八百元。這一約略數字的得到，可以說是作者費盡心血的結果，毫無疑問的，鄭憲對革命經費的研究是本論文最見成績，最深入，也是最具貢獻的成就。

第五章是對同盟會九次軍事起義的分析，他詳細的說明了起義的經過，對起義的領導、成員及經費都有所交待。據作者的統計辛亥三、二九廣州之役，實際殉難的烈士共有九十三人（廣東五十一人，福建二十六人，廣西七人，四川、江蘇、安徽各三人），作者引用他父親的直接資料，指出福建的郭家六人即被一般史家所遺忘。九次的起義共同的特徵是：發動的時間，大體依靠款項決定，亦即經費有著落方發動；發動的地區偏於西南，這是基於地理與軍事活動的難易的考慮。九次起義中以第八次的起義計劃最稱周詳，可惜却在內部的人員調配與消息的傳遞上失敗。至於參與起義的成員，由於同盟會本身缺乏基本武力之故，大體上只能利用當地人民與軍隊的支持，而在運用的對象上也有變化，會黨、農民、綠林是早期的成員，後來防營、新軍與知識分子成了重要的角色，而新軍與知識分子的加入革命陣營，無疑的，導致了革命的最後成功。

(三)

基本上，鄭憲以同盟會為主題，作深入的學術探討，就是一極有遠見的作法，在中國革命史的研究上，他首先完成了奠基的工作，後來的學者，在進行這一方面的研究時，無不以此文為必具的參考書。而鄭氏對革命經費的研究，尤其具有開山式的貢獻。（註四）鄭氏在撰寫此文時參酌了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大宗原始資料，校正了同盟會記載的若干錯誤，同時他又參用了四百種左右的中文資料，八十種以上的外文資料，徵引資料的宏富，更是一大特色。

當然鄭文也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，例如他以同盟會非即與中會之續，但在正文中却詳盡的敘述了與中會的源流與經過，對於居同樣地位的華興會、光復會，則只有一小節的討論，也許這是資料上的限制，但卻難免予人偏頗之感。其次同盟會在民國成立以後，由秘密走向公開，民國元年更改為國民黨，依鄭憲的看法，這些變遷及民元、二年間的國民黨，仍是由孫、黃主持一切，宋教仁的地位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重要。實則宋教仁在這一時期的活動已是被公認的事實，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前倡論民生主義與鐵路計畫，實際上與國民黨的章程黨綱都有差距，而宋教仁在民元以後的政治言論，如力主政黨內閣等，實已成為當時國民黨的顯明主張，而民元八月間宋教仁與統一共和黨的聯繫，乃至國民黨章程的擬訂，無不是宋氏的手筆，當時素反

對同盟會的名記者黃遠庸也說：「宋君此次主持國民黨改組……，於中華民國歷史上必有不可磨滅者。」又說：「同盟會改組事，宋教仁、胡瑛、魏宸組、劉揆一、譚人鳳、張耀曾、李肇甫等主之最力。」（註五）而獨不及孫、黃，亦可見宋教仁的地位。此外，本文第四章革命經費的討探，與第五章起義經費的分析，有若干重複的論列，如能適當的修訂，當更可增加全文結構的嚴謹。

總之，鄭憲此一論文，實已對同盟會的組織、領導與財力，作了極有深度的研究，當然對同盟會一個更為完整的探討——包括宣傳與主義在內的研究，仍有待後人的努力。不過，對於鄭憲這樣一篇深入而有見地的論文而言，最大的遺憾是：作者的不幸過早辭世，而失却了修訂出版的機會！

附 註

註一 參見張玉法：清季的革命團體，緒論。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，民國六十四年二月出版。）

註二 見H. D. Gordon and Shulman (ed.), *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hina - 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, 1945-1970*, (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, 1973.) PP. 46-50

註三 張朋園：高著「辛亥革命與中國知識分子」（書評），中研院近史所集刊，第二期，民國六十年。

註四 鄭憲對革命經費研究的心得，同時也發表在馬來亞大學的魏吉學報上，見：Shelley Hsieh Cheng, "The Tungmeng-Hui and Its Financial Supporters" in *Majallah Pantai, Vol. II*, University of Malaya, 1964/65.

註五 黃遠庸：遠生遺著，卷一，頁一八八，（民國五十二年台北文星書店影印）。又參見吳相湘：宋教仁——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，（台北文星書店，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初版。），頁一九九—二〇四。